

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21年间连获九届冠军

亚洲杯正在进行,中国队首次取得开局三连胜,创下了历史最佳。虽然之后在与澳大利亚的对战中失利,但中国队的拼搏精神赢得赞誉。其实,早在约一百年前,中国足球曾称霸亚洲。1911年,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发起成立了“远东运动协会”。足球项目成为了远东运动会为数不多的比赛项目之一。自1913年到1934年二战之前,共举办了10届远东运动会的足球比赛,中国队包揽了除第一届之外的全部9个冠军。

那么,现代足球何时进入中国,百年前的中国足球又有多棒呢?

“大辫子”足球队称雄上海

当近代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足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体育运动之一。1860年前后,生活在上海的西方人就开展了足球运动。1867年,在洋枪队保护下的上海租界中,洋人成立了足球俱乐部。当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水兵、商人在一起踢足球时,中国人就只能远远地看这番西洋景。

后来教会学校引进了外籍教练,教中国学生踢足球。上海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于1902年成立了“大辫子”足球队,显现出一种横扫千军、无人匹敌的势头。很快,于1896年成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在创办之初,就宣布“体育一事与中西各课一律并重”,并在1902年成立了南洋公学足球队,与圣约翰大学足球队一起被誉为“上海双雄”。

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是清朝翰林。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军肉搏战表现出的熟练军事技术,对唐文治震动很大。他大力提倡西洋体育运动和中国武术。据说,南洋公学足球队流行的一首著名的足球歌,就是唐文治亲自打造的:“南洋,南洋,诸同学神采飞扬,把足球歌唱一曲,声音亮。看!吾校的十个足球上将都学问好,道德高,身体强……一开足,个个生龙活虎,真不愧蜚声鸿誉冠我邦。”

由于当时还处在清朝末年,球员脑后还拖着油光光的大辫子。比赛刚开始时,辫子是盘在头上的。可几圈跑下来,辫子就散了。赛事紧张,根本来不及再盘好,在争抢球

时,辫子甩在对方的脸上,便是一道血痕。

当时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

圣约翰与南洋足球队于1902年首次进行公开赛,每年比赛一次。在他们的带动下,之江、沪江等大学及吴淞商船学校、徐汇中学、中西书院等学校,也相继成立了足球队。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运动会上,圣约翰大学和南洋公学两校足球精英组成的上海区足球队吸引了众多球迷的热捧。虽然他们在与香港足球队的比赛中以0比1败北,但他们敢于拼抢的劲头和精彩的球技还是获得了球迷的好评。

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上海的足球运动一跃成为中国的霸主。上海是最早实行足球联赛的地区,锻炼出一批又一批的足球人才。1913年,华东大学体育联合会成立,成员有圣约翰、南洋、沪江、之江、东吴、金陵大学等6所学校。这几所学校的足球联赛,大大提高了中国足球水平,涌现出不少熠熠闪光的球星。

从此之后,中国的足球开始走出国门,称霸亚洲。

那时,真正投资足球的人几乎没有,国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中国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艺。为参加1936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经过一番在全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般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金17万元,但仍缺5万元。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筹资金,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

各国进行表演赛,以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他们转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60余天,只筹到5万元。

谭咏麟父亲谭江柏曾参加奥运会足球赛

当时的足球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又没有训练经费,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那时候,唯一的训练方法就是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锻炼了队伍。

当时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经过3个月的选拔,1936年4月,中国足球队22人名单正式公布。这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谭江柏。

1922年,年仅17岁的李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球劲旅南华队,出任主力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其出色。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军。1976年8月13日,联邦德国《环球足球杂志》组织世界球王评比活动,李惠堂同来自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阿根廷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一起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征奥运会。尤其在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基奥运会上,作为新中

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是上世纪30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于1936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奥运会。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球队,也是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

中国足球铁军十年连胜日本队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中国队除了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当时与日本队的比赛,经常打出赢四五个球的大比分,压得日本足球几十年抬不起头,日本媒体纷纷报道感慨:“既生瑜,何生亮。”

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券,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1:5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将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纪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

的最大希望。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中国奥运代表团到柏林的路费。

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是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祖,英国队的实力无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声名远播,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场比赛广受瞩目。

1936年8月6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挤得满满,英国女王特地给她的国脚们发来专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结果以零比零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中国队的防守得当,大概13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突然改变了进攻战术,全力以赴发动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队的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球迷和英国当时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柏林奥运会失利后,中国足球队受欧洲各国邀请,开始欧洲之旅,共踢了八场友谊赛。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人以年薪八千英镑,折合中国大洋六万四千块,请李惠堂留在英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了。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中国队除了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

《解放日报》

中共中央缘何为刘伯承过五十大寿

1942年是太行区根据地对敌斗争非常艰苦的一年。这一年,在日军严厉的经济封锁和残酷的大“扫荡”下,根据地粮食缺乏,军民们不得不以野菜、糠、柿子面,甚至树皮充饥。

这年冬天,又恰逢刘伯承五十岁生日。在敌后抗日军民中,刘伯承有着崇高的威望,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高尚的人格品德,时时感染着周围的将士和群众。蔡树藩、李达等人提出,应该给刘伯承庆祝一下五十大寿。政委邓小平决定,把祝寿活动搞得隆重一些,对此他有着更远的想法。

刘伯承并不赞成给自己庆生

一二九师将为刘伯承祝寿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来做,以电报的形式,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作了请示,毛泽东、朱德等人欣然同意。这场由一二九师政治部发起的庆寿活动,上升为由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批准和决定的重大政治活动。

刘伯承并不赞成别人给他庆生,他不希望别人和组织上为他个人的生活搞特殊。当周围的人去询问刘伯承是哪一天生日时,刘伯承闭口不说。蔡树藩只好询问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可是她跟刘伯承一个想法,也笑而不谈。

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为配合刘伯承的五十大寿庆祝活动,《新华日报》(华北版)和一二九师的《战场报》需要刊登刘伯承的履历和个人事迹。

刘伯承见到两名记者来访,态度非常慈祥和蔼。可是,当他从李达口中得知两人的来意后,态度和语气便变了:“大家都这么忙,谁出的这么一个主意?一个人有生死,都生

报站,在日本占领区买回二斤白糖,作为祝寿贺礼,送到了刘伯承床前。刘伯承没有收下,反而批评说:“前方战士没有饭吃,冬天没有棉衣,打仗没有子弹,你说这白糖我能吃下吗?”司令部的人难以说服刘伯承收下,只好去请来邓小平。邓小平非常关心刘伯承的身体,认为白糖可以在上火时冲水喝,就帮着劝说。邓小平知道以个人的名义无法说服刘伯承,最后是以“党委的决定”,要求刘伯承收下白糖。刘伯承无法拒绝“组织的命令”,只好勉强收下了。第二天,他便让警卫员把白糖转送给了根据地的医院。

李达见状,便找到邓小平,请他再来劝说刘伯承。邓小平深知刘伯承的脾气。他走近刘伯承,言词非常简洁、利落:“师长,我看还是要讲呀。这也是工作,而且是中央决定的嘛。没有年谱、履历,没个文字介绍,咋个祝寿吗?他们已经来了,师长就谈谈吧。”说完这番话,邓小平转身就离开了。他没有给刘伯承留下回旋的余地。刘伯承只好说:“要说这是工作,是任务,我就无条件服从。组织决定嘛,个人无话可说的。”

于是,刘伯承坐下来,向两名记者谈起了他个人的经历。在交谈中,为了帮两名记者顺利完成任务,刘伯承完全是站在报纸宣传的角度,从他1892年出生,一直谈到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为止。言语间,对他个人经历中涉及的一些时代背景、思想演变、经验教训等,也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邓小平代刘伯承喝祝寿酒

1942年12月16日是根据地军民为刘伯承祝寿的日子,赶到王堡、赤岸参加祝寿大会的,除了驻地的领导,一二九师所属各军区、各军分区、各旅的代表,太行区每个村子还派了一名群众代表前来祝寿,人员有5000多人。

主持庆寿活动的是邓小平。在活动仪式开始后,他第一个上台宣读祝文。随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邢肇棠、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罗瑞卿、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太行分局副书记李大章、抗大副校长何长工、日本反战同盟代表山田等人也都上台向刘伯承致辞祝贺。

祝寿的代表们上台致完贺辞,刘伯承最后上台。他先向大家致谢,然后读了自己写好的五十岁“自励铭”。他谦虚地说道:“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1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祝贺五十寿辰的

报道。

寿宴所用的桌子都是向附近村子老百姓借来的。由于桌子有限,很多赶来祝寿的人只能在村外的操场上,几个人围坐在一块儿就餐,中间摆上三个饭盆,一盆炖肉,一盆烩菜,一盆馒头。肉和菜都是有限的,而馒头管饱。在生活异常艰苦的那段岁月里,人们欢天喜地地吃了一回饱饭。

刘伯承不吸烟,不喝酒,就是在寿宴上,别人给他敬酒,他也没有破戒。在向刘伯承敬酒时,与会人员临时选出了两个代表,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军委朱穆之代表“武装同志”先敬,李庄代表“文装同志”后敬。

大家都知道刘伯承不喝酒,所以敬酒人喝完酒,轮到刘伯承喝酒时,邓小平就主动站出来,说由他“代表”。当然,邓小平也没有多喝。

为刘伯承组织的这次祝寿活动,集中展现和弘扬了抗战军民们一种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宣传了一种抗战必胜的希望、理念和信心,让处在艰难斗争条件下的抗日军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祝寿活动的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远大于表面形式,也成为中共抗战史上,借助庆寿活动开展政治动员和斗争宣传的精彩篇章。

韩王山《党史博览》